思想战线 SIXIANG ZHANXIAN Thinking 2008年第2期 第34卷 №.2, 2008 Vol.34

# 《史记》"四裔传"与秦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

王文光，仇学琴*

摘　要：《史记》"四裔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部简略的秦汉边疆民族史，是研究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发展最基本的文献。司马迁以黄河流域为地理基点，以华夏文化为中心，逐一对汉朝边疆的民族按方位进行了叙述，全景式的再现了当时中国边疆民族的发展概况、生产力水平、民族关系、民族融合情况，对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史记》"四裔传"；边疆民族史；民族关系；民族融合

汉朝国家政权的建立不仅使汉族统一起来，也直接统一了汉族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并在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如何有效地从政治上治理少数民族及其分布的郡县，就成了历史学家对民族历史特别关注的一个政治动因，于是便有了司马迁首创的《史记》中的"四裔传"。

在司马迁首创的《史记》"四裔传"中，司马迁对围绕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各边疆民族逐一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朝鲜列传》，如果我们将这些民族传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可以认为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部简略的秦汉边疆民族史，它和以前所有的历史著作中只记载某个民族或者是关于几个民族只言片语的记载相比，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一、《匈奴列传》与北方民族史的研究

作为汉代除汉民族外第一个强大民族群体的匈奴，制约和影响着中国民族在秦汉时期的形成与发展，故《匈奴列传》从民族史研究的角度看最为重要，在《史记》中有关少数民族的六个专传中，有三个传与匈奴相关，数量上占了"四裔传"的三分之二。这也说明了司马迁对匈奴的重视。

司马迁对《匈奴列传》的谋篇布局是很有讲究的，一开始主要从族源、族称加以介绍："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荤粥，居于北蛮，随畜而转移。"①

其后司马迁又从匈奴的文化特点、社会结构、民族性格、婚姻习俗的角度介绍匈奴："其畜之所多，则牛马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贵健壮，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② 此段文字基本上反映了匈奴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说明匈奴是一个典型的游牧社会，因为财富的问题，盛行族内转房婚。

《匈奴列传》所反映的匈奴历史从总体上来说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冒顿时代以前的匈奴社会由于尚未以匈奴作为整个北方民族的民族名称，因此可以认为是一个先匈奴时代；第二，冒顿强盛时代；第三，匈奴的分化与融合时代。

在《匈奴列传》中，早期的匈奴实指整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群体。各游牧民族群体之间有着近亲血缘关系。其中匈奴最强，所以将众多民族写入《匈奴列传》，传中所提到的民族有西戎、戎狄、畎夷、戎夷、犬戎、山戎、戎、猃狁、戎翟。从这些名称上来看，大都带有戎字，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泛匈奴民族群体，而戎字的前边或后边所缀有的字，则是戎的支系，可能因方

*作者简介：王文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091）；仇学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650091）。

①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9页。
②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9页。

位、居住地、崇拜对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早期的诸戎对华夏族的冲击较大，民族关系较为紧张，按历史顺序有如下一些大事：

周族的先祖公刘因为西戎之故失去先祖传下的官位，大王古公亶父也因为戎狄的进攻而败逃岐山之下，营建了雒邑，奠定了周族最早的基础。

但到了周文王、周武王时代，周族开始对犬戎进行反击，西周后期，犬戎与周族的势力又互相消长，由于周族王室的衰落，犬戎南下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结束了西周的历史，这是先秦时期农耕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遭到游牧民族致命打击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春秋时期，戎狄仍然是华夏民族北方的一大威胁，戎狄除了在军事上以强大的力量进攻与之相邻的燕、齐等诸侯外，还利用周族王室的矛盾和虚弱，在政治上影响着周族的发展："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之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余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① 这一阶段戎狄民族群体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大到可以攻破周朝的都城，给中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给周族心理上造成巨大的压力，"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②

在上述华夏族到了危急之时，华夏族内部各政治势力也在争霸，利用反击戎狄的入侵来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故可以认为戎狄的南下侵扰成就了齐、晋等大诸侯国的霸业。到了战国晚期，秦赵燕各造长城防御匈奴，并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叙事过程中，把犬戎、山戎等名称逐渐向"胡"集中，并紧接着说："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③ 其后就有了赵将李牧、秦将蒙恬北击匈奴的故事。

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写到这里才正式提到匈奴，那么为什么此前司马迁不说匈奴，而只说戎狄、西戎呢？这是因为匈奴作为北方戎狄中的一部分，到战国时日益强大，成了北方民族的代表，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因而将匈奴作为所有北方民族代表性的统称。

冒顿是匈奴历史上一位胆识过人的政治家，即单于位后，首先击败了其东边强大的东胡。并顺势乘胜扩大领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走月氏（河湟的民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万。"④ 从此，冒顿完成了中国北方大草原的地区性统一，打破了北方草原政治多极化的格局，特别是击灭东胡后，成为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的大帝国；强大的匈奴帝国对汉民族建立的汉王朝国家政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民族的发展。汉王朝的基本国策和对外政策便主要以对付匈奴的南侵而展开。所以《史记》中有关边疆民族的六个传中，有三个传与匈奴有关。

冒顿建立的奴隶制国家政权对中国北方民族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因为冒顿完成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的统一，对北方民族的发展乃至中国民族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从表面上看，匈奴帝国强大的军队，组织严密的政权组织确实能保证其良好的运行，但这个政权从一开始也就孕育着分裂，因为游牧生产方式导致了他们的流动性和社会财富不易集中，当碰到内部纷争、外部力量冲击或自然灾害时便难以进行有效应对，故貌似强大的国家随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很快兴起又很快消亡的历史原因。

汉初立，国家弱，而匈奴正强，南下到了太原，高帝亲征于是有平城之围。战争的结果是"使刘敬结和亲之约。"于是有了汉匈的和亲故事。高帝崩后，吕太后和孝文帝都以和亲求和平。但匈奴由于其特定的游牧经济类型、文化传统，所以一方面和亲，另一方面仍旧南下杀掠汉族民众。

面对匈奴强大的攻势，汉朝总处于劣势，仍以和亲求和平，争取以长城为界不相侵扰。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汉武帝时代。汉武帝初立，仍奉行文、景二帝故事。到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⑤ 虽然双方没有发生战斗，但从此双方关系就恶化了。

---

①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 2881页。
②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 2882页。
③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 2886页。
④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 2890页。
⑤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 2905页。

对此，汉武帝在元光六年（前 129年）遣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北击匈奴。之后又不断对匈奴发兵直到征和三年（前 90年），共 45年，双方都因此造成了人员和经济上的损失。汉匈关系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入塞南下，终融入了汉族等民族，丰富了汉族的数量与质量；而北匈奴西迁，则改变欧洲民族发展的格局。

在对《匈奴列传》简要的论述后，有必要从更为宏观的历史和文化视角来探讨相关问题。

首先，从经济发展类型看，汉民族的农耕经济为主导型经济，而匈奴游牧经济为依附型经济，双方需要有一定的能量交换，特别是对于匈奴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匈奴不能生产布帛、粮食、铁器，如果没有正常的交换渠道，必然引发匈奴的掠夺战争，因为对匈奴来说和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社会快速发展的物质需求，所以才会一方面有和亲存在，但另一方面仍有匈奴南下“杀略而去”的情况发生。但从景帝、武帝开始，以官方的名义正式开辟关市，打通了汉匈双方的物质能量交换的渠道，这大大有于汉匈双方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关系。

其次，虽然匈奴对汉民族农耕区进行掠夺，造成过和汉民族经济上的残破，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游牧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民间还是以和平方式进行交换，因为农耕民族需要游牧民族的马匹、皮革，而游牧民族又需要农耕民族的粮食、布匹和金属工具。

再次，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游牧民族总是融入农耕民族，尽管游牧民族有作战的机动性，常在军事上显示出优势，但当他们一旦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便在自身的农耕化过程中消失，最终成为农耕民族的一部分，南匈奴的消亡便是如此。

## 二、《史记·大宛列传》与西域的民族及民族关系

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政治生活的核心，它制约着汉王朝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所以有了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寻找大月氏夹击匈奴。在《史记》关于周边民族情况的各传中，《大宛列传》的内容最为丰富，由张骞寻找大月氏，引出大宛、大夏、西南丝绸之路，因此可以将《大宛列传》作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史、西域民族关系史、西域文化史的第一手材料。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亲临的国家是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传闻的国家是乌孙、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

对此，梁启超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说：“冒顿时代，匈奴大强，西域诸国，皆被服属，凭藉深厚，为中国忧，故当时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匈奴。而发此议而实行之者，自张博望始。”①

张骞大约在公元前 139年出使，但出使不利，“终匈奴，匈奴得之，传旨单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走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②

大宛国王欲汉的财物，希望为骞寻月氏，得汉财物，但最终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不成，可是张骞却达到了大宛、康居，抵月氏，游大夏，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当时上述各地的情况。

虽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完成联合月氏攻击匈奴的使命，但对于好大喜功，热衷于开疆拓土的汉武帝来说，得知除汉朝之外，海内（天下）还有众多民族（国家），便希望汉朝的影响辐射到当时所知的每一个地方。此外，虽然匈奴被“汉击走单于幕北”，但汉匈民族关系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汉武帝仍要继续推行开疆拓土、击灭匈奴的战略计划，于是有了张骞于元鼎六年（前 116年）第二次出使西域联合乌孙攻击匈奴的行动。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向乌孙说明来意，不料这时乌孙国家分裂，国王年老对汉家公主不感兴趣，由于乌孙在地理上远汉近匈，所以诸大臣惧怕匈奴，无人愿迁回故地，张骞又一次不得要领而归。

但张骞按事先的计划，同样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去访问。与此同时，乌孙也派导译送张骞还，汉朝与乌孙开始走上了结盟的道路。

当然，汉乌联姻之后，双方仍没有达到团结互助抗击匈奴程度，匈奴的余威仍在，所以当李广利出征大宛，希望乌孙发兵相助，但乌孙虽然发兵二千，却“持两端，不肯前。”由此可以说明汉在西域的力量尚不扎实。

汉武帝爱大宛马，所以汉朝与西域各民族的关系由单一的政治交往，开始向以马匹交易为中心的经济交往转化，但由于大宛离汉朝遥远，不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 2022页。
②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 3158页。

肯给汉朝大宛马, 武帝闻之, 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 在太初元年 (前 104年) 第一次进攻大宛。但首战失利, 退守敦煌。武帝盛怒, 增加援军, 再攻大宛。

太初三年 (前 102年), 李广利再伐大宛, 所到之处各国出迎供粮, 在杀死不迎的轮台王后, 汉军直抵大宛城, 围攻四十余天后, 大宛贵族临阵杀大宛国王。汉军得到了大宛好马, 并扶持亲汉的大宛贵人昧蔡为王, 虽然后来昧蔡后被杀, 但亲附汉朝, 遣太子为质、年贡马二匹成为定制。

伐宛大胜之后, 汉与西域诸国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统辖关系, "而敦煌置酒泉都尉; 西至盐水 (孔雀河), 往往有亭。而轮台有田卒数百人, 因置使者护田积粟, 以给使外国者。"① 从此, 西域开始纳入汉朝统治, 轮台成了经营西域的前哨阵地。

《史记·大宛列传》是研究匈奴史除《匈奴列传》外的重要史料, 叙述了汉匈在西域的政治力量对比, 以及汉匈双方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同时还是研究汉匈民族关系、汉与西域各民族民族关系、西北民族关系、汉民族经营西域最早的史料, 甚至是研究亚洲史、世界史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总之, 《史记·大宛列传》是汉民族认识西域、开拓西域、经营西域最早的史料, 其学术价值重大。

## 三、《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与相关的民族研究

《史记》中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所记的民族都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 但与匈奴等民族相比, 他们在汉武帝时基本都已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统治之下, 即南越地区设了南方的南海等九郡, 东越地区设了闽中郡, 西南夷地区设了益州等郡, 在朝鲜地区设了临屯等郡, 这些地区内的各民族到汉代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 所以《汉书》中才将他们全部列入《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 故本处就合在一起讨论。

《南越列传》中所记载的南越是百越民族分布在华南到中南半岛北部的一支, 称其为南越是以分布的方位来命名, 实际上他们应是百越中的骆越支系。由于赵陀在南越分布区建立了南越国, 所以南越既指民族名, 也是政权名。

《南越列传》是研究华南开发史、华南民族融合史的主要材料, 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 论述秦始皇开岭南, 设南方三郡和赵陀自立的历史过程: "秦时已并天下, 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 ……秦已破灭, 陀即击并桂林、象郡, 自立为南越武王。"② 从地区民族发展史的角度看, 这是十分重要的事件, 表明华南正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部分骆越也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居民。

第二, 《南越列传》的主体是记载赵陀所建立的南越国与汉王朝的关系, 同时也有赵陀家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融合的记载, 这对于研究汉越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意义都十分重大。

第三, 面对赵陀的割据, 汉武帝派兵击灭之, 设立了南方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九郡, 使汉朝的疆域达到了今天越南中部。

《东越列传》记载的是越王勾践的后代, 他们的首领叫无诸、摇。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 在他们的分布区设立了闽中郡; 楚汉相争之时, 因为无诸、摇 "率摇人佐汉。汉五年, 复立无诸为闽越王, 王闽中故地, 都东冶。孝惠三年, 举高帝时越功, 曰闽君摇功多, 其民便附, 乃立摇为东海王, 都东瓯, 世俗号为东瓯王。"③

汉武帝时, 无诸的后代余善自称 "武帝", 为汉所不容。汉武帝元封元年杀了余善, 结束了闽越王的割据, 并将闽越人迁徙到江淮间, 以后这些闽越人逐渐汉化, 成了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而也导致了百越民族分布区向西南的退缩, 汉民族的分布区也向东南方大幅度地推进。因此, 今天研读《东越列传》还可以大大加强汉民族形成发展史和分布变化的动态过程的深入认识。

东瓯则是由于不向政府纳贡, 同时还参加 "七国之乱", 也被迁到江淮间与汉民族杂处, 最后融入汉民族之中。

《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 "西南" 并不是现代的西南, 司马迁所说的西南是以巴郡、蜀郡为基点, 将巴郡、蜀郡之西北、之西、之南的地区称为西南, 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被称为 "西南夷"。具体地来说西南夷地区相当于今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五省的相关地区。

对西南夷的生产方式、文化习俗司马迁曾

---

①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 第 3179页。
②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 第 2967页。
③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 第 2979页。

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根据司马迁以生产方式为基点的分类，还可以将西南夷分为“南夷”和“西夷”。

南夷，在巴蜀之南，“耕田、有邑聚”的夜郎、靡莫之属、滇为南夷，属百越系民族。南夷主要分布在今贵州、云南。南夷的生活习俗为椎结，生产方式为耕田；已经定居。

西夷则有两种情况，嶲、昆明，生活习俗编发，生产方式游牧，社会发展尚处于无君长的社会；氐徙、筰都、冉駹、白马，已有君长，生产生活方式或定居半畜半农，或游牧不定。

司马迁对西南夷的记录虽然不是自觉的进行民族识别，只是从文化上进行分类，但客观上却具有民族识别的学术意义。

在《西南夷列传》中还记载了庄蹻入滇、秦开通五尺道、汉武帝对西南夷的治理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于研究西南民族历史有重大的价值。

庄蹻入滇前，滇国已有发达的文明和国家政权，是庄蹻用武力夺之“以兵威定属楚”，故滇国是庄蹻建立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从滇文化考古中已得到证实。五尺道开通后，对经济文化交流意义亦很大，即“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另外司马贞《史记索隐》有：“旧京师有僰婢”的记载，说明僰人之女还被远卖到长安为奴婢，而“以此巴蜀殷富”更表明西南对中国文明发展的贡献。

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和治理，首先是设置了郡县，使西南夷地区在政治上加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所设立的郡县有犍为郡（初在今遵义，后移至四川宜宾，辖今云贵川三连接地区）、牂牁郡、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益州郡。

《朝鲜列传》是《史记》中最短的一个民族传记，但对于东北地区乃至于东北亚的历史都有重要价值。

据《朝鲜列传》所载，秦末汉初，有燕人、赵人、齐人亡命朝鲜，燕人卫满还夺了朝鲜王位，成了朝鲜国王。因此，朝鲜半岛的民族具体来说是以当地土著为主，并融合了许多华夏民族而形成的复合民族，华夏文化影响很深，“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战国时）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郭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氵贝水为界，属燕（王）。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氵贝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① 以上可见，秦汉时期的朝鲜既是汉朝在东北的一个地方政权名称，也是一个多源合流的民族名称。②

汉代，辽东太守以羁縻方式治理王满外臣，而王满则在汉王朝的支持下，加强对朝鲜半岛各民族的控制，“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③ 王满死后，传子至其孙右渠，右渠一方面大量吸引逃亡塞外的汉人，一方面又不让真番夷等入见汉天子，于是汉朝双方发生矛盾。汉武帝募天下罪犯攻击朝鲜，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在元封三年（前 108 年）打败右渠，平定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朝鲜地区被纳入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统治之中，至于后来的历史变化是另外的事，但不能否定的是汉朝在古朝鲜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的历史事实。

总之，上述各传是研究秦汉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发展最基本的文献。《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所载的越族历史，对今天研究汉民族融合史、汉代的汉越民族关系有重要意义；《西南夷列传》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众多西南少数民族古代历史的最基本线索，弥足珍贵，对后来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史的人都是从研究《西南夷列传》开始的；而《朝鲜列传》对于研究汉代朝鲜人的融合与发展，汉朝对东北的经营与治理，乃至于今天研究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与历史都有很大价值。

（责任编辑　何斯强）

①司马迁：《史记·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 2985页。
②厉声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87页。
③司马迁：《史记·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 2986页。